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列寧著

第二國際的破產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四年。莫斯科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第二國際的破產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四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本版列寧著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書，係按蘇
共中央附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學院所編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一卷原
文譯出。

所謂第二國際的破產，有時人們單純是從事情的形式方面來理解，如理解爲交戰各國社會黨間國際關係的中斷，既不能召集國際會議，也不能召集社會主義國際局¹會議等等。具有這種觀點的有中立小國的一些社會黨人，甚至也許是這些國家裏大多數的正式黨派，以及機會主義者及其擁護者。科索夫斯基先生在俄國刊物崩得²的消息小報第八期上，曾以值得深深感謝的坦白精神表明維護這一立場，而該小報的編輯部連隻字片語也沒提到不同意作者。可以相信，竟至極力爲投票贊成軍用預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進行辯護的科索夫斯基先生維護民族主義，會幫助許多工人澈底認識崩得派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本質。

對於覺悟的工人來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嚴肅的信念，而不是市儈式調和的企圖和民族主義反對派的企圖的良好掩蔽物。覺悟的工人把第二國際的破產理解爲多數正式的社會民主黨驚人地叛變了自己的信念，叛變了斯多德牙爾和巴塞爾國際會議³上的演說和決議中那些極爲莊嚴的聲明等等。只有那些不願意看到這個叛變，不利於看到這

種叛變的人，才會看不到這個叛變。若是以科學態度即從現代社會階級關係的觀點來說明問題，我們應當說，多數社會民主黨，首先是第二國際的最大和最有勢力的德國黨已站在本國參謀部、本國政府、本國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了。這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事件，不能不對它加以盡量全面的分析。早已公認，戰爭雖然引起各種恐慌和災禍，但它總是帶來相當重大的益處，因為它無情地剖露、揭穿和破壞人類制度中許多腐朽、衰頹和垂死的東西。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的歐戰也已開始給人類帶來顯著的益處，因為它向文明國家的先進階級表明，在其黨內成熟了一種可惡的膿瘡，並從某處傳來難聞的死屍味。

(一)

歐洲主要的社會黨對自己全部信念和任務的叛變是否存在呢？顯然，不管是叛徒自己，不管是那些確切知道——或是模糊地猜測到——自己不得和叛徒友好妥協的人，都不喜歡談到這點。但是，無論第二國際的各種「權威人士」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他們一派的朋友是多麼不愉快，我們也應該面對現實，直言不諱，向工人們講出真理。

關於社會黨在這個戰爭之前，在預見這個戰爭時，怎樣看待自己任務和自己策略這個問題的事實材料是不是有呢？無疑是有的。這就是一九一二年巴塞爾國際社會主義代表大會的決議，我們現在把它和同年德國社會民主黨

黑姆尼茨代表大會的決議翻印出來，作為關於社會主義的「被忘却的語言」的提示。這個決議給各國宣傳和鼓動反對戰爭的大量出版物作過總結，它是社會主義對戰爭的觀點和對戰爭的策略的最確切而全面，最莊嚴而正式的說明。無論哪一個昨天第二國際和今天社會沙文主義派中的權威人士，即不論是漢德曼，不論是黑得，不論是考茨基，不論是普列漢諾夫，都不敢向他們讀者提起這個決議，他們不是對決議隻字不提，就是引用（像考茨基一樣）其中次要的地方，而迴避整個重要的內容，單是這種事實，就不能不稱作是叛變。通過了最「左」的、極端革命的決議，而却極無恥地忘却它們，或是拋棄它們，這就是第二國際破產的一個最顯明的表現，而同時這也是下述事實的一個明顯的證明：即只有那些絕頂天真幼稚，幾乎是狡猾地想使以前的偽善永垂千古的人，才能相信單用一些決議就會「修正」社會主義，「矯正它的路線」。

漢德曼可以說還在昨天，即在他戰前轉到保護帝國主義立場的時候，被所有「正派的」社會黨人稱作是瘋癲的怪人，沒有一個人不是用輕蔑的聲調來談他的。而現在，各國著名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却完全滾到漢德曼的立場上去了，他們之間目前只有色彩和氣質的不同。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用點文雅的詞句來評述和介紹如像我們的話⁴的作家這一流人的公民勇氣，因為他們是用輕蔑的筆調描寫漢德曼「先生」，而却用恭敬的（或是諂媚的）態度談——或是隻字不提——考茨基「同志」。難道能夠容許把

這樣的態度與尊敬社會主義和自己一般信念的態度調和起來嗎？如果你們肯定漢德曼的沙文主義的虛偽性和毀滅性，那麼還不應該批評和抨擊更有威望和更加危險的保護這類觀點的考茨基嗎？

最近，黑得分子久馬在我們希望什麼樣的和平的小冊子裏面，幾乎是淋漓盡緻地表達了黑得的觀點。這個「黑得研究室主任」在這本小冊子的扉頁上他是這樣署名的），自然，「引用」社會黨人以前的愛國主義聲明（像德國社會沙文主義者達維德在其最近那本論保護祖國的小冊子中引用此類聲明一樣），但是：巴塞爾宣言他却不用！普列漢諾夫對於這個宣言也是隻字不提，而以異常悠然自得的神情，談論沙文主義的庸俗觀點。考茨基像普列漢諾夫一樣：引用巴塞爾宣言時，拋掉裏面全部革命的部分（即其全部重要內容！），——大概是藉口書報檢查機關的禁止……由於警察和軍事當局用檢查書報的辦法禁止談階級鬥爭和革命，這樣就「正好」幫助了社會主義的叛徒！

然而，巴塞爾宣言也許是某種空洞的宣言，裏面沒有任何確切的内容，即完全有關當前具體戰爭的歷史内容和策略内容吧？

恰恰相反。巴塞爾決議比其他決議，空洞的語調較少，而具體的内容是較多的。巴塞爾決議談的正是已經爆發的這個戰爭，談的正是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爆發的這些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奧國和塞爾維亞爭奪巴爾幹的衝突，奧國和意大利爭奪阿爾巴尼亞等的衝突，英國和德國爭奪

市場和一般殖民地的衝突，俄國和土耳其與其他國家爭奪阿爾明尼亞和君士坦丁堡的衝突，——這就是巴塞爾決議在預見目前這次戰爭時，所談到的事情。巴塞爾決議恰好論及「歐洲列強」間的目前戰爭時說，這個戰爭是「絕對不能用什麼人民利益爲藉口來作辯護的」！

假若現在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我們以兩個最典型的和我們最熟悉的，一個用俄文寫作、另一個被取消派翻成俄文的有威望的社會黨人爲例——找到（在阿克雪里羅得幫助之下）各種對於戰爭的「人民的（或者更正確點說，是平民的、即從資產階級街頭報刊取來的）辯護」，假若他們裝作學者的派頭，並滿懷大批假的馬克思引言來引證「實例」，即引證一八一三和一八七〇年的戰爭（普列漢諾夫）或一八五四——一八七一，一八七六——一八七七，一八九七年的戰爭（考茨基），——那麼，的確，唯有那些沒有一點社會主義信念，沒有絲毫社會主義良心的人，才能「認真」地對待此類論據，才能不把它們稱作是空前的詭譎、僞善和對社會主義的糟蹋！讓德國的黨總部（「弗爾什坦德」）因爲梅林格和盧森堡的新雜誌（國際⁵）對考茨基作了正確的估價而詛罵它吧，讓王德威爾德，普列漢諾夫，漢德曼之流在「協約國」⁶警察的幫助之下，也鄙視自己的敵人吧，——我們則將乾脆翻印揭穿這些領袖的轉變的巴塞爾宣言以回答之；這種轉變只能稱之爲叛變。

巴塞爾決議所談的不是那在歐洲曾有過的，對一七八九——一八七一年時代說來甚至是典型的民族的，即人民

的戰爭；不是社會民主黨人從來也沒拒絕過的革命戰爭，而是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和『王朝利益』的基礎上，在兩個交戰國集團，即奧德和英法俄集團的『侵略政策』的基礎上發生的當前的戰爭。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及其同伴在直接了當地欺騙工人，因為他們重複各國資產階級的謊言（資產階級竭力企圖把這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掠奪的戰爭描繪成人民的、防禦的——不管對於誰——戰爭），並從歷史上非帝國主義戰爭的實例中為它尋取辯護。

關於當前戰爭的帝國主義的、掠奪的、反對無產階級的性質的問題，早已脫出純理論性問題的階段。帝國主義不僅在理論上根據其主要特徵已被斷定為垂死的、衰老的、腐朽的資產階級為瓜分世界和奴役『弱小』民族的鬥爭；不僅在各國社會黨人所有非常大型的報刊上千萬次重複這些結論；不僅例如和我們『同盟的』國家的代表法國人德列西在論臨頭的戰爭（一九一一年出版！）的小冊子中，通俗地解釋說，當前的戰爭在法國資產階級方面也有掠奪性質。不止於此。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代表在巴塞爾一致正式地表明，深信臨頭的戰爭正是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並由此作出了策略的結論。因此，——順便說一下——關於民族策略和國際策略之區別未經充分討論等等藉口（請比較一下我們的話報第八七期和第九〇期阿克雪里羅得最近的談話），都是詭辯主義，應該立刻拋棄它們。

這是詭辯主義，因為全面地、科學地研究帝國主義是一回事；這種研究剛才開始，事實上它和一般的科學一樣，也是無止境的。在幾百萬份社會民主黨報上以及在第二國際

的決議中所闡述的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策略的基礎，這是另外一回事。社會主義政黨不是辯論俱樂部，而是正在進行戰鬥的無產階級的組織，當幾營的隊伍轉到敵人方面時，就應當用叛徒這個名字來稱呼和揭穿他們，不要上了花言巧語的圈套，而花言巧語說『不是所有人都同樣地』理解帝國主義，沙文主義者考茨基和孔諾夫關於這點能寫幾冊書，問題『未經充分討論』等等。資本主義的各種掠奪行為，其歷史發展和民族特點的細節永遠也研究不完；關於個別的地方，學者們（而特別是學究們）都永遠爭論不休。『依照這個根據』而拒絕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拒絕使自己和那些叛變這個鬥爭的人對立起來，這是令人可笑的；——但是考茨基、孔諾夫、阿克雪里羅得之流給我們建議些什麼別的東西呢？

甚至沒有一個人打算在現在，在開戰之後來分析分析巴塞爾決議，指出它的錯誤！

(二)

但也許是真誠的社會黨人因為預見戰爭會造成革命形勢，所以贊成過巴塞爾宣言，而事件進程却反駁了他們，革命已成為不可能的了吧？

孔諾夫正是企圖以這樣的詭辯來替自己轉向資產階級陣營的行為作辯護的（在黨破產了嗎？這本小冊子和許多論文中），而且我們幾乎在以考茨基為首的所有社會沙文主

義者那裏都會看到這類暗示式的「論據」。孔諾夫議論說，革命的希望已成幻想，而堅持幻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事情，並且這個司徒盧威主義者⁷連隻字片語也沒提到所有在巴塞爾宣言上簽過字的人的「幻想」，而却裝作一個非常高雅的人，儘量把事情都推到像潘涅枯克和拉狄克之類極左傾的人的身上！

我們從本質上研究一下那個關於巴塞爾宣言起草人真誠預期過革命來臨，但事件進程却反駁了他們的論據吧。巴塞爾宣言說：1. 戰爭將造成經濟的和政治的危機；2. 工人將認為，自己參加戰爭是罪行，是罪惡地「爲了資本家的利潤，爲了各國王朝的虛榮心，爲了履行秘密外交條約而進行的互相射擊」；戰爭在工人中間引起「憤怒和恨憤」；3. 社會黨人應該利用上述危機和上述工人的心情來「激發人民並加速資本主義的崩潰」；4. 「各國政府」——毫無例外——要開始戰爭，就不能避免了自身的危險性」；5. 各國政府「害怕無產階級革命」；6. 各國政府「應當回憶」巴黎公社（即國內戰爭），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等。所有這一切都是十分明顯的思想；其中沒有保證說，革命定會發生；其中着重地正確估計了事實和趨勢。論及這種思想和議論時，誰說預期的革命的來臨已成幻想，誰就暴露他對待革命的態度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司徒盧威主義的、警察式和叛徒式的。

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毫無疑問，革命沒有革命形勢是不可能的，而且不是任何的革命形勢都會產生革命。一般說來，革命形勢的特徵是怎樣的呢？如果舉出下列三個主要

特徵，那我們大概是不會錯誤的：1. 統治階級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某種危機，即統治階級的政治危機給被壓迫階級的憤怒和恨憾造成一個爆破的決口。對於革命的來臨，只是「下層不願意」照舊生活下去平常是不夠的，而且還須要「上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2. 被壓迫階級的貧困和災難超乎尋常的加劇。3. 由於上述原因，羣衆積極性大大提高，這些羣衆在「和平」時期自己忍氣吞聲地受人掠奪，而到動盪的時期，整個的危機形勢和「上層」自己都迫使他們進行獨立的歷史性的發動。

沒有這些不僅不依照各個派別和政黨的意志，而且不依照各個階級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轉變，革命——按一般規律——是不可能的。這些客觀轉變的總合即稱作革命形勢。這種形勢一九〇五年在俄國有過，在西方所有各個革命時代也曾有過；而在德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在俄國一八五九——一八六一年，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這種形勢也存在過，雖然在這些場合中並沒有革命。爲什麼？因爲，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會產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觀轉變加上主觀轉變的形勢下，才會產生革命，這種主觀轉變就是：革命階級能夠發動強大的羣衆革命行動，足以粉碎（或摧折）舊政府，因爲這種政府，如果不「推」它，是永遠，甚至在危機的時代也不會「倒」的。

馬克思主義對革命的觀點就是如此，這種觀點屢次爲一切馬克思主義者所發揮，被認爲是無可置辯的，而對我們

俄國人來說，它們特別明顯地爲一九〇五年的經驗所證明了。試問，一九一二年巴塞爾宣言在這方面預料些什麼，而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來到些什麼？

所預料的是革命的形勢，這個形勢以「經濟和政治的危機」這句話，就可簡要說明之。它是否來到了？無疑，是的。社會沙文主義者連奇（他比孔諾夫、考茨基、普列漢諾夫之流偽君子更爲直率、公開、真誠地保護沙文主義）甚至這樣說：「我們在經歷一種特殊的革命」（見他著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和戰爭小冊子，一九一五年，柏林版，第六頁）。政治危機是存在的：任何一個政府也不相信明天，任何一個政府也擺脫不了財政破產、割讓領土、被逐出自己國家（好像比利時政府被驅逐那樣）等危險。各國政府都活在火山口上，自己都求助於羣衆的自動性和英雄主義。歐洲的政治制度已整個被震撼，大概誰也不會否認，我們已進入（並且愈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戰那天寫到這點的）極偉大的政治動盪時代。考茨基在宣戰兩個月之後寫道（一九一四年十月二日新時代雜誌⁸），「政府從來沒像戰爭開始時這樣強大，黨從來沒像戰爭開始時這樣軟弱」，這就是考茨基爲了向狄得庫木之流⁹和其他機會主義者討好而偽造歷史科學的範例之一。政府從來沒像戰爭時期這樣需要統治階級所有各個政黨一致支持，這樣需要各被壓迫階級「和平地」服從這個統治，這是第一。第二，假若「戰爭開始時」，特別是在預期很快達到勝利的國家中，政府彷彿具有無限威力，那麼任何一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把對革命形勢的期待完全與戰爭「開

始」時期連繫起來，而尤其沒有把「彷彿」和實際同等看待。

至於說歐戰將是慘酷無比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看到和承認的事情。戰爭的經驗愈益證明這點。戰爭在擴大。歐洲的政治基礎日益動搖。羣衆的貧困情況是令人髮指的，而政府、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儘量不提這些貧困的作法亦愈來愈遭受失敗。某部分資本家從戰爭中獲得了空前的高度利潤。矛盾非常尖銳。羣衆內心的憤怒，受折磨的、愚昧的階層對於善良的（「民主的」）和平的模糊期望，在「下層」中開始的怨言——這一切都是存在的。而戰爭愈是拖延和劇烈，政府本身則會愈益激發並且定會激發羣衆的積極性，號召他們作過分緊張的努力和自我犧牲。戰爭的考驗也像歷史上各種危機、人們生活中各種大災大難及各種變革的考驗一樣，可以鈍化和淘汰一些人，但同時却啓發和鍛鍊另一些人，而一般講來，在全世界歷史上，後者的數目和力量除了某個國家遭受崩潰和毀滅的這種個別場合外，是比前者多的。

締結和平不僅不能「立刻」中止所有這一切的災難和整個的矛盾尖銳化，反之，却在許多方面使最落後的人民羣衆更加深切地感到並且更加明顯地看到這些災難。

總而言之，革命的形勢在多數先進國家和歐洲列強中是存在的。在這方面，巴塞爾宣言的預見完全證實了。若是像孔諾夫、普列漢諾夫、考茨基之流那樣，不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否認這個真理，就是對它隻字不提，那麼這就是漫天扯謊，就是欺騙工人和效忠於資產階級。在社會民主

黨人報¹⁰（第三四，四〇，四一期）*上，我們引用了一些材料，其中表明，害怕革命的人們，即基督教市僧神父、參謀總部、百萬富翁的報紙都不得不肯定，歐洲革命形勢的標誌是存在的。

這種形勢要持續多久，還要尖銳到什麼程度？它是否會引起革命？這點我們不知道，而且誰也不可能知道這點。只有先進階級，即無產階級革命情緒的發展的經驗及其向革命行動轉變的經驗才能說明這點。這裏根本談不到什麼「幻想」，談不到打破幻想，因為，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無論何時何地都沒保證過，恰好目前的（而不是未來的）戰爭，恰好是現在的（而不是明天的）革命形勢要產生革命。這裏所指的是一切社會主義者的最明顯和最基本的任務：即必須向羣衆揭示革命形勢的存在，解釋革命形勢的廣度和深度，激發無產階級的革命覺悟和革命決心，幫助無產階級向革命行動轉變並建立適應革命形勢的組織以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任何一個有威望的和負責的社會黨人無論何時都沒敢懷疑過，社會黨的任務就是如此；而巴塞爾宣言並沒散佈和懷抱任何「幻想」，它恰好在談到社會主義者的這個任務時說道：激發、「振奮」人民（而不是像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考茨基那樣以沙文主義來麻痺他們），「利用」危機來「加速」資本主義的崩潰，以巴黎公社和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二月的實例作指南。現代政黨不去完成自己這

*見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七五——七六、一五八——一五九、一六九——一七〇頁。——編者註。

個任務，這就是表明它們的叛變，表明它們政治上的毀滅，表明它們拋棄了自己的作用，表明它們投向資產階級。

(三)

但是，第二國際的最著名的代表和領袖怎麼能夠叛變了社會主義呢？我們先研究一下「在理論上」替這種叛變來辯護的企圖，下面再詳細談這個問題。我們試說明一下社會沙文主義主要理論的特徵，普列漢諾夫（他主要是重複英、法沙文主義者、漢德曼及其新擁護者的論據）和考茨基（他提出的論據比較更加「精密」，更加具有極為嚴肅的理論的外形）可以算是這種理論的代表。

關於「罪魁」的理論幾乎笨拙到極點。人家侵犯了我們，我們在防禦；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反擊歐洲和平的破壞者。這是各國政府的聲明和全世界所有資產階級刊物與黃色刊物的濫調的翻版。普列漢諾夫甚至連這個如此陳腐庸俗的見解也一定要用這位作家所刁滑引用的「辯證法」來加以粉飾：即爲了估計具體的形勢，據說首先需要找出罪魁，予以懲罰，而其他一切問題留待另一種形勢中去解決（見普列漢諾夫的小冊子論戰爭，一九一四年巴黎版；另見阿克雪里羅得在呼聲報第八六和八七期上對這個論調的重複）。在以詭辯主義偷換辯證法這件崇高事業中，普列漢諾夫打破了紀錄。詭辯家抓住「論據」中的一個，但黑格爾已正確地說過，人們完全可以爲宇宙萬物找出「論據」。辯證法要求對某社會現象在其發展中給

以全面的研究，要求把外表、外象歸結於根本的動力，歸結於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鬥爭。普列漢諾夫從德國社會民主黨刊物上引用了一句話：德國人自己在戰前承認奧國和德國是罪魁，——這已足矣。至於俄國社會主義者屢次揭穿沙皇侵略加里細亞、阿爾明尼亞等等的計劃，普列漢諾夫却隻字不提。那怕是最近三十年的經濟史和外交史，他也一點不打算涉及；而這段歷史確鑿地證明，侵佔殖民地，掠奪他國的土地，排擠更爲順利的競爭者並使其破產就是目前交戰列強集團雙方政策的重要核心*。

* 甚至不惜冒充社會主義者的英國和平主義者布萊勒斯佛爾德的鋼和金的戰爭一書（一九一四年倫敦版；本書刊行於一九一四年三月）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十分清楚地意識到，總的講來，民族問題已不存在，已經解決了（第三五頁），現在問題不在這裏，現代外交的典型問題（第三六頁）是巴格達鐵路，供給修該路的軌軌、摩洛哥的礦山等問題。作者正確地把法國愛國人士和英國帝國主義者爲反對凱約想（在一九一一和一九一三年）基於瓜分殖民地勢力範圍和容許德國證券在巴黎交易所流通的協議而與德國調和的企圖而進行的鬥爭，當作是『歐洲近代外交史中最可注意的事件』之一。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破壞了這種協議（第三八——四〇頁），帝國主義的目的就是要把資本輸出到較弱的國家中去（第七四頁）。英國依靠這種資本所獲得的利潤在一八九九年是九千萬至一億英鎊（吉芬），在一九〇九年是一億四千萬（皮施），我們得補充一下，路易·喬治在不久前的言論中把利潤算成二億英鎊，即幾乎達二十億盧布。卑鄙的伎倆，收買土耳其貴族的活動——在印度和埃及爲子弟們覓取地位——這就是事情的實質（第八五——八七頁）。一小撮人從備戰和戰爭中獲得利益，但擁護他們的是社會和財政資本家，而跟和平擁護者走的是分散的人民（第九三頁）。現在高談和平及廢除軍備的和平主義者明天會成爲完全依賴軍火商的政黨的黨員（第一六一頁）。如果凱約國將來比較強大的話，它將奪取摩洛哥並瓜分波斯，而同盟國則會奪取的黎波里，鞏固在波斯尼亞的地位，征服土耳其（第一六七頁）。倫敦和巴黎在